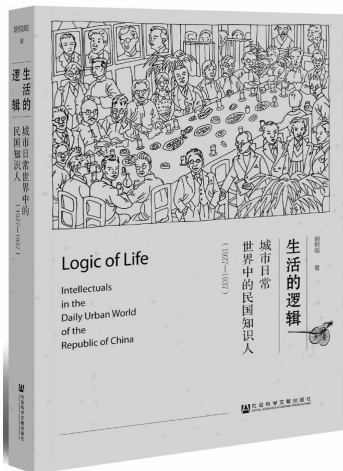


民国知识人的城市生活日常

虽然时局不好,生活和收入大致是闲裕的,更主要是气质里的自如



《生活的逻辑》
胡悦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8月

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日益明确了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逐步形成并稳固了各群体的思维形态与文化模式,以都市人群中知识分子阶层为聚焦对象,从吃穿住行、人际网络、精神层面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全面观察“五四”之后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这就是历史学者胡悦晗的专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的要旨。日常生活如何进

入历史书写?作者主张文献基础上的深入阅读与挖掘。本书的资料来源有四:一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二是上海、北平市政府编撰的各种反映城市生活的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三是《现代》《良友》《妇女杂志》等刊登的城市生活文章;四是《新文学史料》《温故》等一批以刊发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回忆类随笔为主的当代杂志。四类资料相互印证,搭起框架,力求以己之力尽可能提供真实、细致的图像。

研究的出发点是“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的丰富,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物欲扩张和情欲解放,不仅使得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政治诉求,发生了向金钱拜物的经济和欲望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都市生活的人伦和道德,相比于旧时代的农业伦理,在若干向度发生了转变。作者勾勒了北京与上海的形象,“文化北京”意味着30年代真正形成的北京城市居民的一种对传统元素不断循环往复的“回收”再利用的生活方式;“文明上海”意味着肇始于晚清时期声光化电物质文明造就的一种以各种感官刺激体验为主的海派娱乐生活风格。在“文化”与“文明”的幕布上,作者展开了论述,切入四类资料所展示的各类场景。

书中有处细节,谈到近代上海人的人生三大要素,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这种生活观反映了“奢侈之风炽而势利之念深”(陶百川)。即,看衣服断人。作为上海知识群体微妙心理的概括,也很恰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它事实上还反映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转换。这种转换并不独表现在服饰上,比如,作者谈到上海的亭子间居住格式,一方面是

住宅空间物理意义上的靠近,而另一方面则是邻里之间有意疏远。上海人的社交活动很少放在私人空间的家里,而是在作为公共空间的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中展开。北京知识群体则喜欢在家庭里举办牌局、宴请与清谈,比如林徽因主导的“太太的客厅”,话题多涉时局,体现了一种公共议题在私人领域之间的传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市,在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与私己领域之间的界限,是一个重要的分疏,也就是说,在公与私的拉锯之中,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亟待知识群体重新建构。本书所呈现的主体经验叙述,以及这种叙述所依托的情感,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通过四类资料直面民国知识人的感受,他们的职业流动、经济收入、物价水准、医疗条件、四合院与洋房、汽车与黄包车、茶馆与舞厅、戏台与旧书摊、爱情婚恋、体育娱乐……方方面面,纷繁复杂。个人的书写大多落笔自己的琐碎生活,而他们的公共指向往往有着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何者为私,何者为公?两者的模糊交叉,或者换种状况之下的过分区隔,对的就是一种特殊意味的公私缠结。私与公,作为民国知识人建构的都市生活的一体两面,结合北京、上海不同的城市气质与都市语境,呈现了身处其中的叙述者,以及从他们身上组合、折射的时代的征候。

作者所选取的这十年时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虽然时局不好,生活和收入大致是闲裕的,更主要是气质里的自如。这种自如可以让他们在公、私之间实现顺利转换,这种转换牵连时代的脉搏。即将到来的历史大变动,终究会带来新的、更大的社会要求,知识人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呢?

林颐

问人生,叹华年

凌丽芬以时尚职人的独特视角,撰写了一曲都市女性的成长之歌

《华年》
凌丽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华年,该是诗人最喜欢的词。自李商隐写了“一弦一柱思华年”,后世便有无数诗人与之唱和。前有北宋词人贺铸的“锦瑟华年与谁度”,后有现代诗人席慕容的《七里香》:“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华年从此停顿”。

凌丽芬的新书《华年》,书名一语双关。表面上女主人公的名字杜华年,仅是借自李商隐的《锦瑟》。但华年寓意青春美好,如果将华年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话,她的人生绝不会像席慕容的诗句,永远停顿在美好时光里。凌丽芬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要成长、要行进,要经历人生逆旅的华年形象,既美好也不美好。那么,她的锦瑟华年将与谁共度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开了《华年》这本小说。

杜华年生在江南古镇,外公家算是镇上的大家族。虽然如此,母亲杜若飞并非外公亲生。母亲要强,一生都有一个“关山度若飞”的梦。可偏偏到了华年这里,母亲不让她去上海读书就业。少时玩伴乐宝先行到了上海,在她的催促下,神秘的上海对华年充满了吸引,她一意孤行地逃出了家门。怎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旦踏入上海这个“纸醉金迷”的都市,华年的人生轨迹便无法完全由自己掌控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人生需要关注三件事:亲情、事业和爱情。原生家庭与儿时记忆不能丢,有了事业赚了钱才能体面地活下去,但无论事业多么好,还要有个好归宿。杜华年就是在这三个维度的人生里跌跌撞撞,通过凌丽芬灵巧的笔触,一个生动立体的独立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华年初入职,进了一家投资公司市场部,除了做一个跑里跑外,毫无存在感可刷的小文员以外,还要到鞋店兼职,才够补贴在上海的生活用度。偶然听说有机会进入投资部,华年拼命努力,却因潜规则而落败。那努力的劲头,竟然成了周围人的笑柄。人生努力永远都不会错,终于,她逮到机会,进了投资部。由此,展开了她作为职业投资人的辉煌之旅。

人生的活法大抵如此,巅峰时要提防下落,跌倒了要懂得自己爬起来。小说里的杜华年仿佛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令我们懂人间冷暖,知巨测人心。当然,在事业受挫之时,她的挥金如土和醉生梦死,也会令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到底还是精神财富大于物质享受的。就像钱钟书说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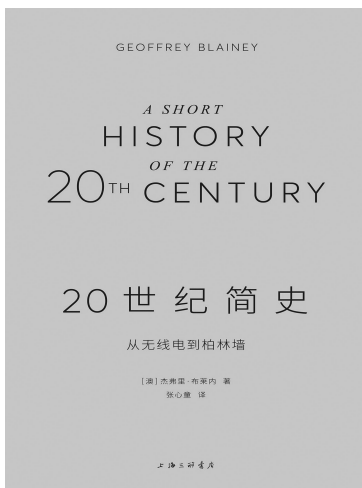
凌丽芬以时尚职人的独特视角,撰写了一曲都市女性的成长之歌。扬扬洒洒四十五万字,浓墨重彩写下的都是女性形象。在女人的世界里,男人只是陪衬。而在现实社会的钢铁丛林里,女人们自己,佻动眼泪厮杀起来,也毫不留情。杜华年与父母的亲情,与乐宝的友谊,与宋星河的爱情,都是她流泪的借口。可华年记得母亲说过,“有出息的人遇到事情不会哭”。母亲的话,好似说给所有在这个世界上讨生活的人听。

凌丽芬在本书的后记里摘录了张爱玲的《半生缘》《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的片断。虽然她没有写明出处,但读者看到曼祯和世钧、流苏和做鞋的范师傅,以及七巧和阿小,就全懂了。还记得,曼祯拉着世钧的手说: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而我们的华年,同样也回不去了。人生的输赢真的没那么重要啊,唯有对着逝去的华年,值得一声轻叹。

夏丽柠

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于人类而言,已经过去的一百年,都是有得有失,有悲有喜



《20世纪简史》
杰弗里·布莱内
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6月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内的史学著作《20世纪简史》有一个副标题:从无线电到柏林墙——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意义非凡的科技发明,另一个是20世纪下半叶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从无线电发明带来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面改变始,到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止,这两件大事构成一个完整的线索,贯穿了人类一百年来走过的路程。布莱内讲述的一大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包括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和不堪一击的和平,孤立地看,所有的事件似乎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回望20世纪的历史,却发现这些事件无不相互关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布莱内将20世纪的历史编织成一个清晰的脉络,并为我们厘清这些微妙的关联。

“20世纪灿如旭日,横空出世。它承载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希冀。”的确,对于世纪之交的人类而言,已经过去的一百年成果丰硕,他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即将到来的20世纪也一定会为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明天。人类其实是信心十足,且满怀期待地步入20世纪的,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世事也果然如他们所料,科学昌明,物质丰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气象。欧洲主宰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城市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尽管有不少威武强大的欧洲帝国将会在20世纪的进程中四分五裂,但至少在当时,它们依然保持着繁荣昌盛的势头。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世俗主义的发展,唯我独尊的宗教受到质疑,新的意识形态逐渐蔓延开来。器物的变化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摧毁生命的武器,救死扶伤的医药,以及交通、能源和各种节省劳力的设备应运而生,地上和海下的电报,瞬间就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城市联结在一起,世界在变小,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地球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村庄……

但是,20世纪初期的真实状况,显然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而是时时凶险交织、暗流涌动。无论是种族之争,抑或是宗教较量,只要是利益攸关,世界各大国之间其实从来不曾停止过明争暗斗,即便是偶尔的一颗火星,也可以点燃起战争的火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报纸和教堂门口公布的死亡名单令他们心生恐惧,一战还为后来的诸多事件定下格局,“或催着一些事提早发生,或拽着一些事慢点儿走,还有一些事,被拦路改了道”——俄国革命,30年代经济危机,乃至希

特勒和纳粹德国的抬头,均为一战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既有一战的祸因,也是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独裁的结果,二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了战争,军民伤亡人数近亿,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万多亿美元。两次世界大战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可谓胜者惨胜,败者惨败,其结局不过再次证明,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主题是热战,那么20世纪下半叶的主题则是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两极阵营,他们之间的冷战风云跌宕起伏,核战的气氛笼罩在世界上空,与之相关的还有火箭竞赛、太空竞赛、威胁和谍报竞赛……不过,尽管冷战的阴云密布,老百姓期盼的依然是和平,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从50年代开始,电视如潮水一般涌入各个国家,它便动或渲染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60年代,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随之而来的则是青少年风潮、黑人权利、环保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吵闹叛逆的摇滚乐和令人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的毒品。意识形态逐渐松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如此漫长的冲突期,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异乎寻常地平复下来,可称史无前例。

20世纪成为历史,无论是世界大战的惨痛,还是科技发明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极大的充盈,对于人类而言,已经过去的一百年,都是有得有失,有悲有喜。正应了狄更斯说过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类面前应有尽有,人类面前一无所有;是踏上天堂之路,还是走进地狱之门,端赖人类自身的选择!

王淼